

从神灵空间到生活世界： 明清以降关林庙与一个地域社会网络的形成

张帅奇

提要：关林庙是地方社会以崇拜关羽为核心而形成的特定神祇空间。明万历中期，多元社群开始大规模扩建与修缮关林，力图构建社会共同敬奉和祭祀关羽的神灵空间，关林庙会相伴而盛。国家权力对关羽信仰体系的褒封性介入，使其被赋予的政治性色彩日益浓厚，俨然成为官方控制地方社会秩序的文化手段。同时，时代变迁与社会文化嬗变促使关林庙宇由单一祭祀神灵场所演变成融祭祀表演、商品交易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互动交流空间，进而形成一个整合民众交际行为且蕴含多元功能的地域社会网络。

关键词：关林庙 神灵空间 生活世界 地域社会

隋唐以降，因封建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北进与经济中心的南移格局形成，使得洛阳由全国政治中心与东西方交往中心一度沦落为区域性商业市镇，城市影响力大为减弱。社会地位变迁致使洛阳城市功能和地理空间结构发生改变，文化性特征日趋显著，城中以神灵偶像崇拜为核心的寺庙和道观林立^①，民间社会神灵信仰活动繁盛。明清时期，洛阳城内祠庙建筑尤以祭祀关羽为核心内容的关林庙最为著名，时至今日庙内香火仍旧绵延不绝，后与1994年兴起的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和春节庙会共同成为展现地方民众生活与区域社会演变的文化象征。宗教祠庙是地域社民精神世界的外化表达方式，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活动之中，不仅是多元社群在特定时期和地点崇拜祭祀神灵的场域空间，亦是沟通民众日常生活、交流社会经济、建构基层秩序的重要手段。同一时期，肇始于关公信仰及祭祀行为的关林庙会与庙宇建筑群相互嵌合，成为彰显洛阳市镇商业交流和凝聚民间信仰活动力量的核心地区，构成地方社会独特的经济文化网络。另外，关林庙作为整合洛阳社会民众意识认同基础的民间信仰场域被重构起来，最终形成一个蕴含多维元素且内部相互作用的地域生活世界。目前的关林空间及庙会变迁研究注重运用碑刻文献去阐释^②，缺少置身实际场景中发掘与感受祠庙长时段演变的现实补充。因此，笔者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范式和日常生活视角去重新审视关林庙背后所隐藏的地方逻辑，通过分析关林庙内部所存碑刻文献与访谈调查所得口述资料，力图在整体原则上建构起关林庙宇空间营造、神灵祭祀仪式表达与日常生活型构相互交织的地域社会秩序图景。

① 笔者分别在2018年11月、2019年6月、2020年10月对洛阳部分古庙宇进行田野调查，其中包括白马寺（洛龙区）、大福先寺（瀍河回族区）、伽蓝寺（洛龙区）、玄奘寺（偃师区）、香山寺（洛龙区）、广化寺（洛龙区）、关林庙（洛龙区）、上清宫（老城区）。

② 目前关林庙部分研究成果有郑文华：《大哉古市新貌：关林庙会古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户华为：《关林之祀与明清洛阳社会变迁——以关林碑刻为核心的考察》，《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郭挺彩主编：《洛阳关林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杨东昱：《从洛阳关林谈祭祀关羽的建筑》，《文物建筑》第6辑；程安霞：《试论民间祭祀空间的可参观性生产——以洛阳关林庙为考察对象》，《文化遗产》2014年第5期；徐婵菲：《洛阳关林庙宋墓人物持画杂剧雕砖考》，《中原文物》2016年第3期；张帅奇：《明清以降洛阳关林庙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一 多元群体与关林神灵空间营造

多元社群对关羽崇拜和信仰需求互相嵌合，彰显出“我者”群体文化认同的行为表征。“上自都城，下至虚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龛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龛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惟恐或后。”^① 社会信民狂热崇祀关羽，以至争先恐后敬献金银营造关帝祠庙，持续形塑关林建筑布局和庙会空间边界，形成包蕴具象空间、空间表象和空间实践三位一体特征的物化建构空间。^②

关林最早是曹操以王侯之礼厚葬关羽首级之处，“权送公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③，位于“洛阳县南门外离城十里，汉时有庙，及今年久损毁”^④。庙宇自东汉末年修建至今逾越千年，原有建筑因年久失修亦早已损毁，整体规模和形制已无法完全窥知。然而，考究洛阳汉寿亭侯元冢却可略知一二，“夷考当时，盖以王礼葬也，且汉至今耿耿不磨，代代有崇封显溢”^⑤。有庙则举庙会，有庙会则行祭仪，明万历二十年（1592），关林已形成数万人规模的关王冢会^⑥，洛阳周围社民云集关冢，共同朝祀关圣帝君和焚祝祈愿。关林庙会作为社群信仰空间的一种展延形式，它的生成是以庙宇建筑为物质空间依托，但庙会具体形成时间却已无从追溯。^⑦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因关林庙宇无存、祀神空间乏修，洛国王（伊王朱珂璠）疏请创建殿宇，以为栖神之所。^⑧ 但因工程浩大、资财紧张，洛阳知县钱公首举善人陆应选为管理修造，功德主赵可大、张九韶、季舟、王禄相与赞理^⑨，号召四方乡众社民慨然捐募，中间所含地方官吏倡导、当地乡民助建关羽祠庙色彩不言而喻。同时，洛阳仕宦乡民感念关公功德，各发虔心，亦踊跃筹款舍地。洛阳府学生员李上林、皂角树住人姚大禄、车家村赵恕以及县吏杨寅等23人施地68亩4厘。^⑩ 河南府卫洛阳等县各村居住信士，社首梁子魁、穆大林等纠领众信民，喜舍资财，买二梁金柱一根，用价银18两；宝幡二首，老爷面前悬挂。^⑪ 另外，洛阳县两信女社以社首郭门郭氏和社首张门詹氏为主导，合有二百余人各献己财捐建殿宇。^⑫ 两信女社众以城乡妇女居首，中间不乏地方藩王妃妾与官宦命妇参与，凸显传统社会女性合理延伸闲暇

① 徐渭：《徐文长逸事》卷19，万历四十二年（1614）钟人杰刻本，第15页。

② 参见张笑夷：《列菲伏尔的“空间”概念》，《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③ 魏襄修，陆继辂纂：嘉庆《洛阳县志》卷19《冢墓记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85页。

④ 《重建关王冢庙记》：镶嵌关林正殿后墙门西侧，万历二十四年立。

⑤ 《创塑像壁记》：镶嵌关林财神殿前墙西南角，万历二十六年立。

⑥ 参见郭挺彩主编：《洛阳关林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⑦ 被访谈人：ZY，女，46岁，洛阳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访谈时间：2019年6月19日，访谈地点：洛阳市图书馆。据访谈内容可知：关林旧有殿宇已基本不存，现有空间规制主要是从明晚期至今多次扩建、修缮完成的。关林庙会具体诞生时间已无从考证（原始资料大多不可考，只是零星内容散落地方志中），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史志编纂多以旧存碑刻界定明万历时期作为庙会生成时间。

⑧ 参见《创塑像壁记》：镶嵌关林财神殿前墙西南角，万历二十六年立。

⑨ 参见《洛阳县康家庄等里施地立碑记》：镶嵌关林正殿后墙门西侧，万历二十四年立。

⑩ 参见《洛阳县康家庄等里施地立碑记》：镶嵌关林正殿后墙门西侧，万历二十四年立。

⑪ 参见《洛阳等县信士施金柱、宝幡碑记》：镶嵌正殿后墙门西侧，万历二十四年立。

⑫ 参见《新建关爷冢庙施财信女碑记》：镶嵌正殿后墙门东侧，万历二十四年立。

时光和主动调剂枯燥生活的行为目的^①，但本质仍属女性局面自身私益而敬神追求心灵安慰的宗教范畴。

洛阳多元社群筹资舍地营造关林善举不胫而走，近县他乡信民闻讯纷至沓来，捐资助修庙中殿宇。汝州善人潘志道等8人承认关老爷大殿左边明柱1根，价钱8500文，油漆在外；北乡西店街毛三省等3人施钱200文；毛三晋等16人舍钱1600文。^②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南昌府南昌县人在河南等处游商，时遇洛阳城南奉敕修建汉武安王崇封义烈老爷正殿，社首杨同、熊正梁众信人等共议喜舍梁柱，布施银70两。^③是时，关羽被朝廷重封义烈真君，威灵更为感应，所会之期，朝祀焚香者络绎不绝，俱被暑渴，社首杨廷檀见状，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六月初二日，速齐一社，施舍茶水，是为首善。^④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四方社群捐募兴建的关王大殿、廊房以及配享神龛正式完竣，标志关林殿宇建筑中轴线布局雏形已基本厘定，但本次扩建规模却十分有限。

自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开始，关林庙中其他建筑陆续动工，远近府县信众相继捐资施助。江西信人杨同、熊正梁等为老爷司冠，计每年春秋送冠，各出资财，共钱拾千，修盖配殿一所。^⑤河南怀庆府孟县吏，西田寺住善人、功德主苗之硕蒙圣贤老爷显化，于万历二十五年进香告许大殿暖阁三间。^⑥万历中期以来，因关林始终没有形成与关羽身份级别相配的庙宇建筑群落，故万历二十九年关林开始进行基址扩建工程，并大致奠定关林空间面积格局。诸守郡公“充拓故址，广袤八十亩；涓吉倡议，士人兢趋，四方丕应；一时土木，百堵咸兴，群工毕集；宫庭之恤，枚枚实实”^⑦。地方仕宦主张拓建关林基址，四方士绅百姓听闻，或捐资、或出力，踊跃参与庙宇建设工程，王朝宫廷一度拨出内帑以资兴建，足以表明多元社群信仰关羽的虔诚行为。除此之外，山西运城方应宿捐百金，北京等6省49名善人各捐1金，于万历四十七年捐修大殿前月台、甬道和围栏。^⑧河南功德主李树基等107人各输己财，于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十五日修圣公、圣母、百病娘娘殿。^⑨至此，关林庙宇中轴线建筑群落布局完全形成，但因明清朝代鼎革，地方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导致后续关林部分营造工程被迫中止。

万历中期至天启朝，关林庙宇建筑屡经扩建与修缮，整体规模最称宏备，故从清朝初期开始，关林殿宇大多以修葺维护为主，零星伴有添建工程进行。康熙二年（1663），因关林建筑“堂庑尚崩颓而未举，檐楹多倾坏而难修”，钦命提督河南全省地方军务右都督许天宠捐资重葺，16位州县地方官员协心“出俸而赞成”^⑩，这是清朝开国后首次对关林殿宇修葺，掀起多元社群新一轮规模化兴修庙宇热潮。康熙五年，地方官员再次捐修八角亭，并立“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

① 参见赵世瑜：《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128页。

② 参见《洛阳汝州善人施财碑记》：镶嵌正殿后墙文东侧，万历二十四年（1596）立。

③ 参见《江西商人、河南善人施助大殿碑记》：镶嵌正殿后墙门东侧，万历二十四年立。

④ 参见《义社施茶造铃叙》：镶嵌正殿东墙，万历二十四年立。

⑤ 参见《江西善人建配殿碑记》：镶嵌鼓楼台基东墙，万历二十五年立。

⑥ 参见《河南怀庆府、开封府等地信士捐助碑记》：镶嵌正殿前墙门东侧，万历二十九年立。

⑦ 《关圣陵节府诸公构亭留鹿记》：2000年出土仪门西门洞南边古柏间，万历二十九年立。

⑧ 参见《汉寿亭侯关圣冢庙石栏记》：矗立正殿月台西侧，万历四十七年立。

⑨ 参见《河南府澠池、永宁等县信众捐助碑记》：镶嵌仪门下东侧，万历四十八年立。

⑩ 《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镶嵌拜殿东墙，康熙二年立。

显关圣大帝林”碑于亭中^①，成为今时定名“关林”的溯源佐证。乾隆五十六年（1791），穆和兰等36名地方官吏捐俸^②，居洛商民18名以及37家山陕商号捐资白银1245两，增建关林庙前戏楼（千秋鉴楼）、月台、甬道以及东西牌坊。^③道光十年（1830），知洛阳县事马懿等86名省内各府州县官吏、居洛商民7名以及2家商号施银1976两和钱1098千文重修关林殿宇，惟正殿与启圣祠因费用缺乏中止，期望来岁筹捐议行，马懿去职后，庙宇修缮一事被迫搁置。^④道光十八年，马懿复官仍知洛阳县事，号召洛阳阖邑士绅乡民慷慨捐输银340两和钱6521余千文，再次重修关林祠宇，修葺工程规模超过历次。^⑤

自清朝建立至光绪朝，政府官吏、士绅商贾以及乡民社众约460余人，190余家商号，先后对关林进行25次大小修缮与添建，施银总计5804余两、钱62932千文、银元31块，役使洛南两乡车3000余辆和民夫2万名。^⑥民国25年（1936），张学良、刘峙途径洛阳，感悟关羽忠义之气，倡议各界捐款以修复关冢围墙。^⑦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各地商号和社会贤达争先募资，易新圣像衣冠^⑧，以期鼓舞国民士气，杀敌除奸，尽忠卫国。新中国成立至今，关林以殿宇修缮、添置贡器、彩绘传世壁画等活动为主，基本无新增建筑。^⑨

关林神灵空间并非单独指庙宇建筑，而是涵盖建筑场域和民俗庙会的综合性空间。明清以降，多元社群踊跃募捐银钱持续扩建与修缮关林庙宇，促使以祠庙为空间依托而生成的关林庙会日益繁盛，究其原因无非是社会多元群体希望通过对关帝信仰的崇拜与敬奉为个人或集体谋取利益，或祈求幸福、消弭灾祸，或灵佑仕途，或发财致富，或强化地方控制。基层社区空间演变塑造不同庙宇形态，而庙宇作为一定空间社会表征，对加强社区内部凝聚力以及实现社区精神整合具有重要作用。^⑩伴随地方官吏、士绅命妇、会首社众与地域商民大量聚集关林庙朝拜祭祀，神祇信仰行为、商品聚集交换和人际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最终形成一个包含庙宇建筑和民间庙会的多元化神灵空间。

二 关羽祭礼与地域社会秩序塑造

仪式作为一种表演行为和活动行式，具有且不只局限于表达的形式特征与展演性质，它已完全超越某一单元个体，是融通民众与神祇、精神、权力或圣灵的物化性媒介。^⑪明清两朝统治者对关羽日益尊崇，大力宣扬关羽忠义仁勇品格，促使关羽祭祀礼仪程序日益走向规范化与制度化。同时，关羽信仰因其灵验性与威慑力逐渐被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成为教化臣民、安定秩序与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① 参见《敕封碑记》：矗立八角亭中，康熙五年（1666）立。

② 参见《捐修关林街名》：镶嵌拜殿东墙，乾隆五十六年立。

③ 参见《山陕商人为添建戏楼、甬道等施银碑记》：矗立千秋鉴楼台基东侧，乾隆五十六年立。

④ 参见《重修关林祠宇碑记》：镶嵌拜殿西墙，道光十年立。

⑤ 参见《重修关林祠宇后记》：矗立甬道东侧，道光二十五年（1845）立。

⑥ 参见郭挺彩主编：《洛阳关林志》，第8页。

⑦ 参见《重修洛阳关冢碑铭》：矗立拜殿前月台南侧，民国20年（1931）立。

⑧ 参见《关帝圣像重新衣冠记》：镶嵌拜殿东墙，民国29年立。

⑨ 自1988年开始至今，关林庙共进行23次捐资修缮，捐资主体涉及泰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朝拜团体和关公文化信仰者，以及广东、北京、河南、福建商会企业人士、各地关庙代表人士等。

⑩ 参见黄忠怀：《从土地到城隍：明清华北村落社区演变中的庙宇与空间》，《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⑪ 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一）明清关林祭祀仪礼更易

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根据人的出身、名号以及社会相应运行法则划分身份等级，诸朝享祀神灵一体仿照，因而各朝代祭祀规格和礼仪程式大不相同。^① 汉末，曹操以王侯礼葬关羽（首级）于洛阳南门之外^②，官方祭祀活动自此开始，然关羽信仰最早却局限荆州地区，它常以厉鬼面目为民间百姓私祀^③，并且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祀。④ 宋元时期，关羽神位从祀武庙^⑤，民间私祀亦日益兴盛，但直到明初才形成关帝祭祀独立礼仪程序。

明初朱元璋废止宋元朝廷褒封关羽的名号，恢复原有“汉寿亭侯”封号，企图凸显关羽忠义仁勇品格以加强臣民对明王朝的政治认同，初步形成官方祭祀关羽的时空以及享仪规定。“每岁四孟及岁暮，遣应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又遣南京太常寺官祭^⑥，后改为每岁正旦、冬至、朔、望祭祀，香烛等仪具有恒品。”^⑦ 嘉靖年间关羽祀礼有所提高，“每岁五月十三遇关帝生辰，用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卿行礼；四孟及岁暮遣官祭，国有大事，则告；凡祭必先期题请遣官行礼”^⑧。万历四十二年十月，神宗加封关羽“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称号，“遣官奉九旒珍珠冠一、玉带一四、蟠龙袍一、黄牌一，面上书封号一十六字，至都城正阳门庙供，讫建醮祠”^⑨。神宗加封完成关羽由侯爵向帝君转化的关键性一步，身份地位和祀仪日益向帝王等级迈进，但因晚明皇帝个性特征与政治变动，祀典与褒封身份始终处于不匹称状态。

清朝官方祀关仪典隆重，实唯历朝为特盛，皇帝、京师府衙属官、太常寺正卿或礼部官员亲自到关帝庙拜谒，以行祭礼。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以四月初八、五月十三日祭，六月二十四日以太牢礼祀。雍正五年（1727），加封关世三代为公，郡县胥立庙，后殿设供。二仲月上戊日、五月十三日有司肃祀（后为五月十三日祭，春秋二仲月庚日祭），前殿用太牢，后殿用少牢。^⑩ 清朝中前期，官方对关羽祭仪多有更易，直至咸丰时才形成帝王级别的配享标准与祀典仪制，真正实现由“关羽”向“关圣帝君”的历史性转变。

（二）神灵感应与地方社会治理

关羽祭祀仪典作为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相互嵌套的一种信仰外化表达形式，它所蕴含的信仰

① 参见王欢：《中国古代社会中身份规则的结构化和制度化研究》，《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

② 参见武攀龙修，吴源起纂：顺治《洛阳县志》卷10《陵墓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372页。

③ 关羽于湖北当阳为吕蒙所偷袭杀害，临死之前心中必然充满愤懑之情，故关羽早期应以“厉鬼”面目存世。荆州地区一带民众最初对关羽的祭祀和敬奉可能属于“祀厉”活动，即中国古代鬼神文化中敬奉恶神厉鬼的行为。

④ 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35《关壮缪》，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756页。

⑤ 南宋孝宗加封敕书是封建王朝最早褒封关羽的制诰（正文共175字），这一制诰是王朝国家承认关羽祀典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有力推动民间社会祀关活动的开展。参见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9“庙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1页。

⑥ 参见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卷93《群祀三·京都祀典》，万历十五年（1587）内府刻本，第3页。

⑦ 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卷37《博物汇编·神异典·关圣帝君部汇考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84年，第60215页。

⑧ 张镇：《解梁关帝志》卷1，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第38页。

⑨ 张镇：《解梁关帝志》，第28页。

⑩ 参见石麟纂修：《山西通志》卷167，雍正十二年（1734）山西抚署刻本，第6页。

体系是一种为国家权力认可的特殊治理工具，最终被纳入地方社会治理体系之中。“自古施政化民，未尝不以神道设教者也。敬维关帝忠贯日月，义懍春秋，护国佑民，伏魔荡寇。虽草野妇孺，莫不仰赫赫神灵而肃然起敬。”^①

社会风气是展示政治经济变迁、价值观念取向以及地域生活方式的直观文化表征，国家意志与神灵信仰互相融合对引导社会风俗、促进民众遵纪守法，安定基层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凡一切为民，御灾捍患，祷雨祈晴，求无不应。知其精诚之相通，盖有素也。夫自古忠臣孝子，历代俎豆不废者，所以正人心，厚风俗也……壮穆公之血食天下，自通邑名都，以及遐陬偏壤，无不金碧而尸祝。盖其生为万人敌，死能祸福警戒小民，以闲邪而卫正。其有切于人心风俗者大也。”^② 民间社民认为关羽能震慑邪恶小人、守卫公正，通过神灵引导与规制，利于地方社会形成人心向善的良好风气。

同时，关羽凭借遵义守信、公正无欺形象被奉为商业保护神，用以震慑行业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是帝之神，虽无地勿在，而精爽而凭，不尤在此耶？不宁惟是，五月十三日，偃师令以帝诞辰，将举祀事，卜祭牛，既吉。省牲时，市儉欲以下色者易之，忽颠仆，自诉其罪以死，此尤近事之验也。”^③ 偃师县令将举行关羽诞辰日祭祀，市儉商人企图谋取私利，中途突发疯癫，自诉其罪而死亡。市儉商人死亡或许只是巧合所致，很大可能是突发急性病症死亡，并不能说与关羽显灵有关，但民间社民更愿意将他的死亡附会为关帝显灵，用来反制商业交易中唯利是图、以次充好的行为，凸显关羽公正无欺的形象特征和社会群体内心的功利化信仰心态。

社会动荡时期往往是王朝国家与民间社会大力崇祀关羽神灵之时，王朝国家希冀通过官方敬奉关羽，鼓舞军民士气，镇压地方叛乱，恢复在地方社会的统治秩序。地方民众渴望关帝显灵，消弭战乱，还原和平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当滑县克复之时，贼匪于黑夜拼命突围，官兵施放枪箭，未能真切。城旁庙宇自行起火，照同白昼，官兵两路夹击，始将贼匪截回，悉数殄除。事定后乃知，城旁庙宇供有关帝神像，庙虽焚毁，神像岿然独存，毫无损动。此次逆匪滋事，屡荷关帝灵爽翊卫，实深寅感。”^④ 嘉庆年间，地方官民将滑县平叛之功归功于关羽显灵，有点抹杀将士用命的平乱功劳。但统治者却希望把关羽显灵说辞融入滑县平叛中，告诫百姓任一叛乱都是违背神灵旨意，用以佐证自身政权存在合法性，加强社会民众对王朝国家的政治认同。又“上年逆匪突入禁门时，恍惚之中，仰见关帝神像，畏慑奔窜，立就歼擒”^⑤。官方将天理教匪徒攻入紫禁城被镇压的事变与滑县平乱一同归因于关公显灵，两者运用神灵力量巩固统治的目的相差无别。

赋税是封建王朝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展示国家控制能力的经济支柱，但征收过程因时势变迁而复杂多易。“向来各处，催完钱漕，设有保总、总催庄头、里头、滚头，名目各不同，实则一也。历年举报，户不愿充，屡报屡推，变迁无常。其中花费钱文尽多，不便于民，亦兼不济于公……蒙藩宪杨大人详情，抚部院程大人批，将总催名目，通饬所属，一体革除……爰将府部

① 《关林正殿修葺碑记》：矗立关林甬道东侧，咸丰四年（1854）立。

② 《郡守刘公祖重修壮穆公关夫子庙记》：矗立关林关冢东侧，康熙六十年（1721）立。

③ 《重修关陵庙碑记》：矗立关林关冢前西侧，乾隆五十六年立。

④ 《加封关羽“仁勇”二字碑记》：镶嵌关林关冢南墙西侧，嘉庆十九年（1814）立。

⑤ 《加封关羽“仁勇”二字及以新号相称碑文》：镶嵌关林关冢南墙东侧，道光元年（1821）立。

院批，藩宪扎行条规，详开勒石，永垂不朽。”^① 杨、程二公革除催完钱漕名目叠杂弊政，重订条规，被洛阳绅民勒石关林庙，初衷是宣遵条规和颂扬官员政绩，抑或试图利用关林庙信仰空间神化条规权威性，以获得民众认可与接纳，遏制地方胥吏蓄意坏规。

传统农业社会因生产和生活共同需要而形成水利互利协作关系，继而制订具有约束作用的规约^②，但动态的环境社会变迁往往会导致利益失衡并诱发新的矛盾^③，使得多元社群间产生对立冲突局面。“照得大靖渠渠长、监生杨赞卿呈控霍清源等一案，经本府亲提讯明段结，除判存案外，另定章程十二条，印发该渠长刻石，以垂永远。”^④ 渠长杨赞卿与亩户刻立水利章程，目的是缓解不同群体间的用水冲突，以恢复原有用水原则建构起的区域水利秩序，个中情由恐怕与完漕条规勒石关林庙如出一辙。但时日承久，因洛阳乡民为大靖渠长一职始终争讼不休，不同社群便再次立碑裁定渠长选举、用工以及纳赋事宜^⑤，以期平息地方社会内部争端。

除此之外，关林舞楼后墙镌刻多首彰显节妇烈女词赋，表面似与关林祭祀行为无关，实际应属王朝国家借助演艺娱神戏剧达到灌输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念的目的。《满江红》：“鼎族吴兴，正秀闾，琼枝待字。喜同里，邓郎英发，红丝堪系。媒约久迟乌鹊驾，客游竟拟梧桐死。拜翁姑，儿职妇能供，心坚矢。易衰经，卸簪珥。亲井臼，奉涤丝土产天不吊，高堂又圯。三十年华沉婺女，九重泉路求夫子。只留将，芳烈播词场，贞魂慰。”^⑥ 词赋表明妇女因照顾翁姑、自尽殉夫而获得认可，被授予贞节牌坊，但它应属封建王朝运用国家殊荣塑造文化秩序的手段，本质上是一种超道德的违逆人情行为，更是封建王朝统治阶层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女性群体的人性摧残。

明清以降，关林庙祭祀仪式程序完备有序，国家力量介入色彩浓厚，中央朝廷与地方官民运用关林神灵空间宣扬关帝显灵改良社会风气、护佑封建政权、订立条规处理社会冲突以及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使它一度演变成为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公共空间。然而，这毕竟属于一种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自主解读，国家政权实际只是借用关帝信仰权威去塑造基层社会秩序。

三 关林庙会与民众日常生活型构

庙会是多元社民信仰神灵的实践场所，它是社会民众自愿组织和参与，用以协调日常生活状态的庆贺节点，不仅维系社会民众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更是协调人与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纽带。^⑦ 关林庙会是以崇祀关羽为发端的文化形式，它因时代变迁功能日益丰富，形成多元社民进行敬奉神灵、商品交易和休闲娱乐的多维空间。

① 《藩宪遵批扎行条规》：矗立甬道西侧，道光七年立。

② 参见鲁西奇：《水利社会的形成——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围垸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③ 参见李晓方等：《明清时期萧绍平原的水利协作与纠纷——以三江闸议修争端为中心》，《史林》2019年第2期。

④ 大靖渠章程12条内容涉及开闸分水、渠长充任与日常管理、工钱发放、修渠摊费、水利诉讼诸多事项，具体规定暂且不附。详见：《大靖渠章程十二条》：矗立甬道东侧，光绪二十三年（1897）立。

⑤ 参见《大靖渠会议章程碑》：矗立甬道西侧，民国14年（1925）立。

⑥ 辛未进士吏部员外郎陈林题：《满江红》，镶嵌关林正门广场舞楼后墙，镌刻时间不详。

⑦ 参见王浩：《国内外庙会文化研究学术史述评》，《青藏高原论坛》2019年第1期。

（一）商品交易与社民生活消费

关林庙会肇始明朝万历年间洛阳社民自发朝冢祭祀关羽的香火会，旧称“关王冢会”，清朝道光年间改称“关林庙会”。洛阳府县百姓每遇关羽诞、忌日，共同齐聚关林庙朝觐祭祀关羽，时有“每岁五月十三，九月十三，是日远近毕集，焚香者无论男妇，接踵而来，不啻数万”^①，以期消弭灾祸、获取现世幸福，因“关帝威灵更赫，故往来辐辏者，罔不虔心奉祀”^②。伴随周围府县百姓自发至关林庙焚香祈愿规模日益扩大，以服务祭祀朝拜需要的一系列商业化经营活动相继生成，香烛、布帛、纸钱等祭品和地方特色小吃成为集会交易的主要商品，促使以祭祀集会为中心的关林庙会逐步向商业气息浓厚的区域性交易集会转变。

雍正时期，洛阳官员主持关林祭祀仪典，“每年春秋二祭外，五月十三日，加祭一次，并用太牢之礼”^③。官方祭祀关羽行为吸引洛阳周围州县社民、信众踊跃焚香朝觐，使得关林庙会人头攒动、声势浩大。乾隆五十六年，居洛山陕商人“添建关陵庙前戏楼、月台、甬道、东西牌坊”^④，庙外建筑营造为关林庙会扩展互动空间奠定基础，改变原有局限庙内开展商品交易活动布局，商摊由庙内关王殿一直延伸至庙外广场。关林正殿至正门甬道两侧分列摆摊售卖祭品，正门至戏楼广场两侧陆续出现供应信众饭食的特色小吃摊和手工艺品、文房四宝摊，但是不允许进入庙门内叫卖，实际已构成以大门为中界线，庙内祭祀商品经营和庙外生活用品售卖的二元格局。同时，因商品交易行为频繁和民众消费需求增长，关林庙会举办时间亦发生相应变化，会期由一年三会改为农历每月一会，以满足多元群体自身经济生活和信仰需要。^⑤

民国时期，关林庙会内容已发生显著改变。“旧历每月十三日，与夫一年一度的小满节，乡人均集市于此，谓之‘赶十三’^⑥。是日，适逢‘赶十三’日期，喧声远闻数里，商贾辐辏，就地设肆，有售农具者，有售杂货者，有卖牲畜者，有唱大鼓戏者，有谈相看命者，有叫卖狗皮膏药者，形形色色。且值水灾之后，人人面带戚容，有向关帝像前，以作祈祷清吉之膜拜，有坐在青草地上，恭聆轮回报应之善书，诚惶诚恐，迷信似益加深。”^⑦关林庙会日期变更为农历每月十三日，除却祭祀关公之外，庙会交易商品已拓展至生产领域，农工用具和生活用品成为主要对象，很大程度表明多数摊贩并非属职业化商人，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出售剩余农副产品，以求换取日常所需生产生活资料。伴随关林庙香火旺盛，洛阳乡民百姓便在关林正门至千秋鉴楼广场开展集市贸易，单日逢集，集市交易商品主要以粮食、瓜果、棉花以及蔬菜等农副产品为主，

① 《关王冢施茶铸造铜炉金钟玉磬碑记》：镶嵌关林正殿前墙门东侧，万历二十五年立。

② 《重修关陵碑文》：矗立关林甬道西侧，嘉庆二十二年（1817）立。

③ 《林碑重刻记》：镶嵌关林关冢南墙西侧，乾隆三十三年（1768）立。

④ 《山陕商人为添建戏楼、甬道等施银碑记》：矗立千秋鉴楼台基东侧，乾隆五十六年立。

⑤ 被访谈人：ZGT，男，73岁，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居民。访谈时间：2019年6月23日。访谈地点：关林商贸市场。据访谈内容可知：关林庙会日期历经多次变更，由民国三会（农历正月十三日、五月十三日、九月十三日）演变为每月两会（农历每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后改为每月逢三即举行一次庙会（农历每月初三、十三日、二十三日），每次3天。又增加逢六举行的3个庙会（农历每月初六、十六日、二十六日），每月共六个会，每会会期改为1天。

⑥ “赶十三”集会主要为纪念关公当年五月十三日单刀赴会和交易农工用具及生活品所命名，并且与小满节（会）合二为一。“赶十三”集会买卖人，个个粗布短衫，远望之士土头土脑，近察之克勤克俭，所市非农产即农用，绝少都市浪费之奢侈品。

⑦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上海申报馆，1925年，第56页。

逢关林庙会亦然。^①此后，关林庙宇建筑周围陆续涌现各种商业店铺，商品交易内容日益丰富，庙会生产生活气息浓厚（见下表）。

民国时期关林庙会商品交易内容一览

种类	交易内容
牲口市	牛、骡、马、羊等牲畜
农具市	镰刀、扫帚、牛笼头、木锨、镢头等生产性农具
土布市	服装、鞋帽、绣花头巾、扎花床单、被面、鞋垫等布品
石器	石磨、石墩、猪槽、磨盘等石具
土特产	野菜、野果、香菇、木耳等山货
药材	三七、黄连、艾蒿等药材
流动摊贩	旱烟、吹糖人、膏药、算命、文房四宝等

内容来源：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二）祭祀酬神与社民休闲娱乐

传统庙会为乡村社民享受休闲娱乐提供了合理共有时间和公共社会空间，目的在于揭示乡村社会运行实态和生活历史表象。^②关林庙会原以祭祀关帝和娱神为核心内容，后日益演变成成为地方社民自主制造参与、用以调节日常规律有序生活状态的世俗性活动，更大程度是沟通社会关系、活跃人际交流的重要方式，更好展现出洛阳乡村社会民众平常生活镜像。

万历二十四年，河南府洛阳县信民为庆祝庙中关王大殿落成，助戏一会^③，这是关林碑刻文字所记最早一次娱神戏曲表演活动，后府县社团组织关帝神社皆踊跃前来关林庙会助兴，或对鼓，或赛狮，或演戏，或表演社火，邻近州县社民亦纷纷行香随祭，参与娱神活动。^④同时，信民社团规定每年庙会祀神演戏花费由环居关林四周的二、三两乡所支^⑤，又因“历年修庙兴工车夫，亦为两乡所供，”故嗣后军需车马差徭，一律准免。^⑥千秋鉴楼台口直对关林庙正门，它是各地戏班表演酬神戏剧的空间艺术场所，每遇祀神和庙会日期，戏楼四周会搭建临时戏台，庙会主事轮流邀请戏班对演，俗称唱“对台戏”，演艺剧目多以《单刀会》《保皇嫂》《三结义》等为主，并以台前驻足社民数量评定演艺水平高低。^⑦同治十一年（1872），洛南老艺人王凤桐从南阳取经归来，改革弹唱曲牌形式，融合文武高跷表演为一体^⑧，在光绪六年（1880）关林庙

① 参见陈长安主编：《关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② 参见岳谦厚等：《传统庙会与乡民休闲——以明清以来山西庙会为中心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 参见《大殿落成洛阳县助戏碑记》：镶嵌关林正殿东墙，万历二十四年立。

④ 参见陈长安主编：《关林》，第37页。

⑤ 参见《优免正南路两乡车马差徭碑》：矗立关林甬道东侧，光绪二十九年（1903）立。

⑥ 参见《大清洛南二乡准免差徭碑记》：矗立甬道西侧，嘉庆三年（1798）立。

⑦ 参见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⑧ 参见张帅奇：《明清以降洛阳关林庙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51页。

会一举拔得头筹，声名传遍河南府所辖区域和邻近州县。民国初年，经洛阳大屯艺人解新富从杂调小曲中汲取改造，完善民间故事情节和表演内容，最终促进洛阳曲剧诞生。^①

时间向后推移至民国中期，大批民间弹唱曲艺人开始参与关林庙会活动。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日晚，各地民间演唱艺人、曲剧团体齐聚关林庙中占据小块区域，每摊人数不等，演员不用化妆，使有少量乐器伴奏，通宵达旦演唱，天明即收摊，为白天各神社表演提供场地。各地神社展演娱神活动，尤以洛阳李屯关帝社团表演“领羊”节目最具特色。^②“领羊”活动起源何时已不可考，但庙中碑记所载为万历二十四年，“社首信女朱氏，启心约众，各输己资，今则三次共会钱三千六百文，望置买筒瓦壹佰贰拾个，修建关王君爷大殿。奉献白羊一只，金银云马专祈圣办”^③。另外，庙会当日民间杂技表演亦相当丰富，除却地摊狮子、旱船高跷、排鼓曲剧等传统艺术形式外，还出现狮子上软索、狮子上老杆等相对惊险刺激的节目形式。^④关林庙会定期举行，周围大批城镇乡民被吸引和参与其中，百姓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得以活跃开展，使庙会最终演变成为一种社会娱乐化综合场域。

关林庙会是以服务关帝祭祀仪式为核心的神灵延伸空间，其功能演变是社会变迁视野下关公信仰崇拜、权力主体参与以及公共空间扩展多维元素共致的结果。关林庙会功能走向公共化，日益成为地域民众生活空间表达的展示媒介，继而构筑起一种区域性的社会交际网络。同时，关林庙会所蕴含的文化图式逻辑^⑤自始至终都是规范洛阳绅民神灵信仰和社会交际行为，乃至型构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手段。

余 论

关林庙是以关羽信仰为宗教核心而形成的一种民间社会定期集会空间，它融神灵祭祀、生活消费、休闲娱乐多维功能为一体，层累构造出容纳多元群体与地域社会交织互动的历史过程。关羽信仰始于汉末三国时期，长期以厉鬼形象为荆州地方民众所私祀；两宋时期政局动荡不安，统治者企图通过褒赐关羽封号与列入国家正祀等手段，彰显其忠义神勇的民族气节，以求挽回国家颓势。明清以来，多元社群为达到获取现实世界幸福和追求自身精神超脱的目的，力图构建以关羽信仰为核心的神灵空间，因而从未停止对关林长时段、规模化营造活动，促使庙宇建筑空间结构日益完备。

① 参见盛长柱主编：《洛阳市戏曲志》，《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编委会出版，1988年，第68页。

② “领羊”仪式过程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日，表演社团选取一只白羊，羊头及全身用红、绿两色绸布打结成花团状，演艺人员吹奏洛阳古曲“十万”作为引导，社首捧香于白羊之后，社众紧随社首其后。一行人列队走到大殿关羽神像前，行叩拜礼，社首焚香敬酒，再用酒撒向羊头，如果白羊摇头，表示神灵已经附于白羊身上，赐福社众；如果白羊不摇头，社首就用烫酒浇向白羊头部，白羊遇烫酒必摇头，则祭拜愿望达成，为表示崇拜之心和敬意，这只白羊便作为祭物留在关林庙中。

③ 《洛阳县庄里镇暨护驾窑信众施财碑记》：镶嵌关林正殿后墙门西侧，万历二十四年立。

④ 被访谈人：LM，女，69岁，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居民（信众）。访谈时间：2018年11月26日。访谈地点：关林庙。据访谈内容可知：自关林庙会恢复以来，原有比较惊险刺激的表演形式已不再演出，如“狮子上软索”等。庙会只保留一些旱船、高跷、曲剧表演节目，节目类型已大量减少，地方特色小吃和生活交易产品增多，今时形成关林商业一条街和关林综合贸易市场，商业化特征显著。

⑤ Ortner认为，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存在一套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图式，规范社会行为和型塑互动关系模式，并赋予互动关系以意义。文化图式还重复出现特定社会历史进程中，型塑进入到这一文化图式中的各种历史事件，从而将历史事件结构化。参见：Ortner, Sherry B, *High Religion: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Sherpa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0-61.

关林庙是洛阳社会独具特色的宗教信仰景观，官民祭祀祈愿活动自古绵延至今，但它并非是单独的文化事象，而是整合庙宇建筑营造、民间信仰崇拜、祭祀仪典举办、社会秩序塑造、商品人际交流等多元特征的空间场域，如果以长时段角度去审视关林庙与地方社会互动过程，就不得不将这一地方性知识置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变迁的框架中去思考。

民国以降，关林庙宇空间两度被洛阳官民借用创立地方学校，甚至抗战时期被用作阵亡将士埋葬墓地。民国9年（1920），洛阳贤达李可亭、警察所长张阴楠以及教育界杨星垣等人，筹集底款，假关林庙址，创办尚斌高等小学校。^① 1951年，洛阳县政府响应党中央培养百万人民教师之召唤，经省核示改县立二中为河南省洛阳初级师范学院，以关林廊庑拜殿为教室和宿舍。^② 民国27年，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百三十三兵站医院曾辗转数千里，移至洛阳关林庙，后得洛阳士绅相助，辟庙西南郊高地6亩为伤亡将士埋骨之处。^③ 因国家时局和主导力量变动，关林庙宇空间功能反复更易，凸显权力交织中洛阳地域社会群体间的互动联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关林庙会经济活动呈现比较繁荣兴盛局面，尤以1950年至1951年春季举办的物资交流大会为最，庙会场地由庙内、庙前广场和牌坊街拓展至关林南、北街道，平均每天参会人数达三四万人，规模空前庞大。20世纪60—70年代，政府严格限制城乡集市贸易和宗教信仰行为，使得关林庙会活动急剧减少，祭祀仪典被迫无限期中断。20世纪80年代，政府允许地方自主发展、活跃城乡社会经济，关林庙会从单一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和城乡居民调节生活余缺零售市场转变为以手工业和工业产品为主、兼具批发与零售的大型综合贸易市场。^④ 现代社会将信仰祭祀文化空间和旅游经济模式相互关联，通过经济手段去重塑颇具文化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事象，促使其可参观性生产成为文化发展实践过程的重要方式。^⑤ 在城市化语境下，关林庙在国家力量、市场经济和社会变迁融合作用下被赋予多元化功能，始终居处动态文化建构过程中，呈现复杂时代样态。

纵观关林庙历史演变过程，无论是多元社群参与营造庙宇空间，抑或是运用关帝信仰权威塑造地方社会秩序，还是衍生出颇具公共生活空间性质的民间庙会，三者皆非完全独立存在，而是信仰崇拜、民间习俗以及社会经济的融合体，可以说是信仰经济下重构地方礼仪标识功能的多重手段。关林庙作为洛阳社会一种礼仪标识，它建构起一套多元社群共有的文化实践标准，成为强化地域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来源。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① 参见《洛阳离区公立尚斌高等小学校成立纪念碑记》：矗立甬道西侧，民国9年立。

②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初级师范学校纪念碑》：矗立石狮御道西侧，1985年立。

③ 参见《抗战烈士公墓碑》：2000年3月出土大门外东南约100米处，民国31年立。

④ 参见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第38页。

⑤ 参见程安霞：《试论民间祭祀空间的可参观性生产——以洛阳关林庙为考察对象》，《文化遗产》2014年第5期。